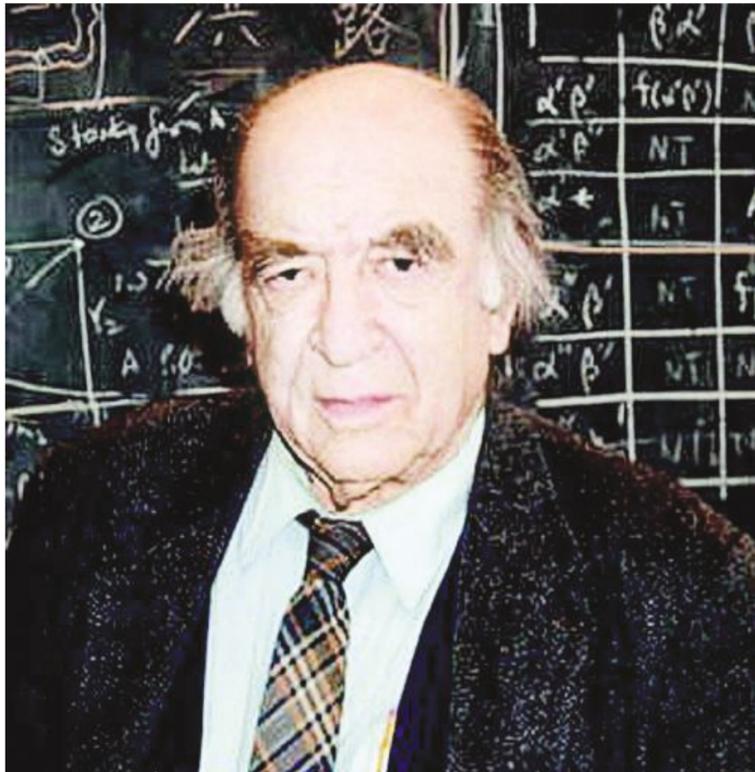


哈耶克对赫维茨经济思想的影响及二者异同

田国强



题,也就是企业怎么会有激励真实显示其边际成本。哈耶克强调以自由、竞争和规则为基本要素的自生自发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他的这种超前的内在逻辑判断在他去世之前就得以验证。

下面,笔者主要谈一谈哈耶克的思想对机制设计理论这一领域主要是赫维茨经济思想的影响及其异同。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谈奥地利学派对机制设计理论的影响及其异同。主要谈三点看法。

赫维茨 1938—1939 学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期间曾上过哈耶克的课,他在多个场合坦承哈耶克的思想对他的经济学思想形成方面所起到的主要作用。确实,哈耶克关于信息分散的讨论是启迪赫维茨在机制设计理论创设之初重点考察经济机制的信息效率问题的重要思想原点。前面提到,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大论战中,哈耶克对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挑战,不仅在当时对于海量计算求解能力瓶颈问题,更重要的在于他所提出的“知识问题”,也就是如何将形成他所必需的分散存在的信息有效收集到中央机构手上去。“由于在一个经济中信息是高度分散的,将所有相关信息汇集到单个机构中的难度是巨大的”,“要么是是不可能的(许多信息将会丢失),要么是对于达到既定的精准性要求的成本太大”,“要么是就没有激励真实显示私人信息,从而缺乏资源配置效率”。

这样,信息有效性、激励相容性及资源配置效率是大论战中的关键词,也是当前现代经

济学中许多领域讨论的关键词或主题,更是衡量一个经济制度(如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或转轨经济)好坏的重要标准。这恰恰也正是机制设计理论所关心的中心主题,更是当下中国改革中制定一个制度或政策时必须加以考量和作为评价标准的。但是,由于当时辩论双方在论战中对于许多关键性的经济概念(如分散决策、自由市场、激励)都缺乏一致定义,内涵和外延常常不相一致,尤其是奥地利学派没有给出形式化的具有严格数理逻辑支撑的明确结论及其成立范围,其结果就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哈耶克曾批评“与他同一时期的数理经济学家对于忽略市场体制中沟通的重要性负有重大责任”。尽管此时的赫维茨尚年轻,还置身于论战之外,但这一理论挑战还是在后来触发了赫维茨对于构建一个基于基础性数学模型的且更加综合的新的经济理论的理论雄心,以使之能够对不同的经济制度进行分析比较,并且早期赫维茨也是从信息维度切入来研究机制设计的。

现实中许多人,包括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常常将现代经济学中许多学派的差异和争论及对一个经济学家的推崇或贬低盲目扩大到耸人听闻的地步。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赫维茨曾言,观点看似差别很大的经济学家常常在许多方面拥有共识。经济学家在大多数方面观点是一致的,从而不会去讨论。要讨论或在争论的只是大家的分歧部分。但由此给外人的感觉就好像其分歧是巨大的。的确如此,经济学的讨论必须建立在一些最基本的共识的基础上。赫维茨

与哈耶克的经济思想有很多共同点,如对分散信息、有限理性等的确认,对经济自由选择、市场机制、分散决策的偏爱,政府主要的作用是维护和服务等。不过,无论是从思想还是从方法论上,二者也存在一些显著的差异。

首先,关于制度是如何产生、如何变迁的认知差异。哈耶克比强调自然演化的社会发展机制,强调要尊重个人自由,尊重一般性规则,尊重竞争,强调整个社会自由是以自生自发的方式形成的,而不是刻意地去创造一种人为干预的自发社会秩序,对夸大理性作用和人为社会设计持批判和反对的态度。这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意涵相近,即人们出于自利本性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形成社会劳动分工,是市场交换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产物,并未意图创造某种秩序,却在客观上起到了增进社会福利的效果。赫维茨原则上认同这些观点,但认为市场是有其适用边界的,一旦超出就会出现失灵,因而不能盲目相信自由放任市场,而市场失灵也正是机制设计的一大必要性之所在。

笔者在这里想指出的是,市场失灵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公共术语,有其准确定义:当出现信息不对称、非完全竞争、外部性或政府角色越位或缺位时,有可能市场会导致帕累托无效配置。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作用,是通过篡改经济学中市场失灵的的基本术语来谈问题的做法,容易造成鸡同鸭讲,失去讨论问题的共同语言,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因而,赫维茨并不主张政府要完全停止指导或干预经济,只是更倾向于一个有管理的经济而非一个受控制的经济。

实际上,经济学说史上对制度如何产生这一问题,国际上就有两派:奥地利学派如何产生这一问题的认识(往前可追溯至亚当·斯密)的制度演化生成观,另一类是康芒斯一脉的将制度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的制度设计生成观。如果说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属于前一种路径的延续的话,那么赫维茨的机制设计理论显然可以被归类于后一种路径的延续。前者偏重实证分析的“演化范式”,后者则偏重基于现实经济制度环境下规范分析的“设计范式”。如笔者在“中国经济学奖颁奖盛典暨第二届思想中国论坛”上的发言《机制设计理论及其对中国改革、发展和治理的重大意义》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两种范式都只是部分而非全部解释了客观现实。

不少中国经济学家根据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哈耶克社会发展秩序及其机制是演化的观点,否定制度设计的重要性。这样的观点是以偏概全,很值得商榷的。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来看,一些制度的确是演化而来的,尤其是社会习俗、风俗和文化这样的非正式制度安排都是演化的结果,而正式制度安排大多是设计的成果,如宪法的制定,制度的制定,体制的选择,改革措施等都基本是基于现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基本制度环境而设计的。比如,美国建国初期基本宪法,就不是演

化的,而是制定出来的,它使得美国在短短100多年的时间成为世界上最强盛国家,是制度设计导致了好的市场经济的典型例子。经济体制的选择,如中国建国后走计划经济道路的选择和改革开放后走市场经济道路的选择,包括改革开放之初的包产到户,如果得不到政府的默许继而合法化,最终作为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确定下来,也就没有现在的局面。因此,对“设计范式”和“演化范式”不能以偏概全,完全肯定一方而否定另外一方的做法不可取。这些经济学家之所以有这样的误区,是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制度设计是任意的,而不清楚制度设计的前提是基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初始禀赋等基本、基础制度环境,好的制度设计要充分考虑到信息、激励和效率,将它们作为考量的基本准绳。

其次,关于理论进路和方法论立场的差异。对于奥地利学派,赫维茨最大的批评是方法论层面的。他认为,奥地利学派基于个体主义的描述性方法存在概念定义的模糊性,对于理论边界的界定不是很清晰,特别是对于自由市场的概念及其适用范围,界定存在混淆不清的地方,这就为该学派学者埋下了盲目相信自由市场、完全杜绝人为制度设计的病根。这也是笔者对国内一些经济学家过度热衷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说,忽视其严谨性不足,不重视基础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等基准理论而提出的警示和批评。由于经济学又是一门外部性特别强的社会科学,具有很大的正负外部性。不像医生,医术不好,受损或医死只是个别人,而一旦用错理论,制定出错误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影响和危及的就不仅是个体,有可能是整个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

与之不同的是,赫维茨虽然也崇尚市场,但不迷信的是,认为市场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失灵不能完全靠演化理性的自发秩序,需要有意识地进行替代或补充机制的设计,他更加推崇新古典经济学所用公理化的逻辑推理方法来提升经济研究的科学性、逻辑性和严谨性,从而给出体制机制的适用边界。机制设计理论就是赫维茨等人从新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来,其中他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局限性的反思,但他没有停留在反思或批判,也没有否定新古典的基准点和参照系作用,而是对其修正发展出了具体广泛应用的机制设计理论。

所以,赫维茨的理论雄心是建立一个具有足够一般性的经济分析框架,在覆盖从自由放任到乌托邦的完整政策频谱,以他的分析框架,奥地利学派显然属于自由放任的一极,但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常常需要在中间地带而非极端处寻找解决方案。将一件事情或事业做成是如此,让中国改革成功更加是如此,任何情况下不能走极端,需要权衡处理,综合治理。比如对中国的改革措施的提出和实施,笔者就提出了需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创新及治理五位一体的辩证互动关系,进而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让政府发挥更好而不是更多的作用。(待续)

《资本论》中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思想阐释(上)

程富富 段学慧

▶▶▶ [上接 6月16日 04版]

寿命已经完结因而要用实物补偿的那一部分固定资本的数量大小,是逐年不同的。如果在某一年数量很大,那在下一年就一定会很小,因此,生产资料的生产总额在一个场合则必然减少。社会再生产中固定资本补偿中的不平衡性,需要用不断的相对的生产过剩来补救,即一方面要生产出超过直接需要的一定固定资本;另一方面,特别是原料等等的储备也要超过每年的直接需要(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生活资料)。社会再生产中固定资本补偿所需要的生产过剩的调节方式,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是不同的。

在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这种生产过剩却是无政府状态的一个要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的多种调控,通过建立再生产的风险调节基金,解决固定资本补偿中可能出现的社会再生产的不平衡问题。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出现过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不过,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以后,应防止西方国家危机的影响和转嫁,预防各种风险和危机。”

六、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计划和比例

(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共产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

按比例发展规律的经典表述是马克思在1868年给库格曼的信中明确提出来的:“要想

得到与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

其实,《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专门阐述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始终贯穿着按比例发展规律的描述。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和消费的有计划性与全社会生产与消费的盲目性,在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下,以经济波动并最终以危机的方式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平衡。资本主义无法自觉地遵守按比例发展规律,“全部生产的联系是作为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当事人。”这种盲目地受价值规律的强制作用实现的经济活动的比例关系,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自由人联合体的生产和消费”是作为他们集体的理性所把握,从而受他们支配的规律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这种生产规模和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的比例关系,是通过“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

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被奉为“一只看不见万能的手”,并被庸俗经济学奉为原教旨。马克思在批判马尔萨斯和萨伊为“万能的手”的辩护时说,他们假定“(1)是资本主义生产,其中每一个别行业的生产以及这种生产的增加,都不是直接由资本家离开社会需要而支配的生产力调节;(2)尽管如此,生产却是这样按比例地进行,好像资本直接由社会根据其需要使用于各个不同的行

业。”恰恰是“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完全是社会主义的生产,那么,实际上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这实际上证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直接由社会需要调节和控制并按比例进行,从而不会发生社会生产过剩的优越性。

资本主义生产也有人为的控制,这种控制是资本家集团为了利润的需要而进行的局部、短期控制。如,当原料价格昂贵而直接影响资本家利润率时,产业资本家就联合起来,组成协会来调节生产。资本家的这些刺激目的一旦达到,他们就会重新让“价格”去调节供给。这种控制其实是资本家集团之间的“短期价格协定”,目的是使资本家的利润不受损,不可能圆满地实现社会生产与需要之间的平衡。“一切企图对原料生产进行共同的、果断的和有预见的控制——这种控制整个说来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根本不相容的,因而始终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或者只是在面临巨大危险和走投无路时例外采取的一种共同步骤。”的想法,都要让位给供求将会互相协调的信仰。”

马克思的分析表明,按比例规律是一切社会共有的经济规律,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化商品经济依靠市场的盲目调节,无法自觉实现按比例发展;只有建立公有制,实行计划调节,才能自觉地实现按比例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中,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国家调节规律或计划调节规律与市场调节规律相结合,才能形成功能上良性互补、效应上协同的有机整体,来实现按比例发展。当今,萨缪尔森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继续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粉饰,并断言市场制度并不是一个混乱和无政府的制度,而是具有一定的秩序。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天然地是一架精巧的机构,能够通过一系列的价格和市场,无意

识地协调着人们的经济活动。显然,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限夸大了市场的作用,其目的在于消减计划和政府的调控作用。

(二)生产的计划调节和簿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开辟了广阔道路

不管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还是未来的产品经济,劳动生产率的衡量标准是一样的,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以单位商品加入的劳动量较少为标志。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在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种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共产主义社会,价值作为历史范畴已经消失,但是作为价值实体的劳动量,依然作为计划调节的内容,也就是说价值依然在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意义上存在。未来社会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社会劳动的浪费,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开辟了广阔道路。与生产的计划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重要。”簿记作为计划执行的手段和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及观念总结,对公有生产比资本主义的私人生产更为必要。“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是要;因此,簿记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但是,簿记的费用随着生产的积累而减少,簿记越是转化为社会的簿记,这种费用也就越少。”

(三)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调节经济发展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资本论》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贯穿始终的。因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

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是“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正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发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旦发展起来,就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巨大的反作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婪导致资本对自然的无节制的开发和利用,引起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生态环境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实际关系就是资本同自然的关系,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生态环境危机实质上是由于资本对自然的疯狂占有和掠夺所引起的资本同自然之间关系的恶化。

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较快地使人和自然的关系得到健康和谐的发展。“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那时,不仅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解决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而且也解决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二百多年的工业文明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取得巨大社会进步的同时,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生态退化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日趋恶化。第四次工业革命——绿色工业革命已经到来,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全球化,能够较快实现全球的绿色革命吗?无疑,在这一进程中,需要各国和国际社会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人与自然才能达到最大的统一。我国自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马克思的分析给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指导原则: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加大国家调节或计划调节的力度。(完)